

趙樹理

大家小集

趙樹理集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大家小集

赵树理集

赵

著 萨支山 选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树理集 / 赵树理著; 萨支山选编.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 8.

(大家小集)

ISBN 978 - 7 - 5360 - 5971 - 9

I . ①赵… II . ①赵…②萨… III. ①赵树理
(1906 ~1970) —文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1388 号

丛书策划: 肖建国 秦 颖

责任编辑: 孙 虹 邓裕玲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平面设计: 苏家杰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广东台山市北坑开发区)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625 6 插页

字 数 23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6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 - 37604658 37602954

网址: <http://www.fcph.com.cn>



赵树理像



赵树理在太行山

像这种群体
众调查研究
中写出来的
通俗故事还
不多见
彭德怀

彭德怀 1943 年为《小二黑结婚》题字

在晋东南农村，
跟郭玉恩一起参加
劳动



赵树理和老战
友、上党梆子名演
员段二森。摄于
1963年5月





赵树理，王亚平，老舍（从左至右）

和女儿赵广建合影





赵树理（第二排左二）与日本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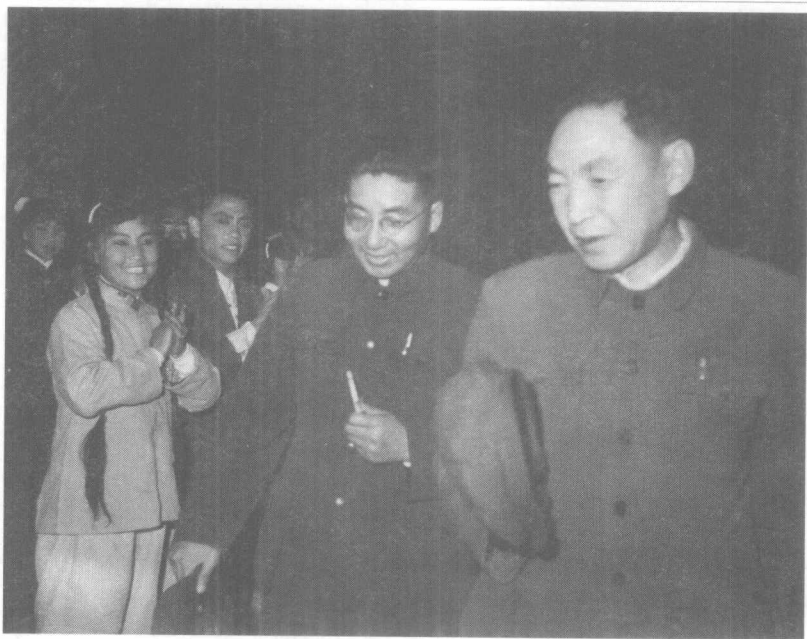
摄于1962年



赵树理（右三）和周扬（右一）在苏联访问



赵树理像



1964年5月，赵树理会见晋城剧团丹河湾的演员



赵树理会见晋东南专区现代戏汇演的演员。摄于1965年10月



赵树理塑像

赵树理手迹

從革命實踐
 中脫胎換骨
 在傳統基礎
 上推陳出新
 河北省永年縣金
 體西潤劇團同志
 留念
 趙樹理

消失的传统

赵树理一直说自己不属于“文坛”，而属于“文摊”。这并不是谦虚的说法。王朔不说自己是作家，而说自己是“码字”的，是因为作家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被沦为调侃的对象，所以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赵树理也要和文坛保持一定的距离，原因却很复杂。

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赵树理的文字，是他被捕后在国民党自新院里写的《悔》和《白马的故事》，写于1929年。那个时候他才23岁。这两篇文字很有意思，前者是说一个“顽劣”小孩因为辜负了父亲的期望而感到内疚；后者是写马的主人对马的疼爱，而他则自比为那匹迷失的马——“好像失路的孤儿”。赵树理1929年的被捕，有些莫明其妙。据他自己分析，是因为当年他在山西第四师范念书时，参与学潮，后逃离学校，就有人怀疑他可能是共产党员。而1928年下半年，沁水县招考小学教师，赵树理考了第一名，转年就到城关小学教书，月薪十元。这在当地算是一个肥缺了，引起别人的嫉妒，于是就有人在教室黑板上用粉笔大书“赵

树理是漏网的共产党”，由是被捕。^①这次被捕，对赵树理的父亲应该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他对赵树理期望颇高，被捕期间又托人打点，花费颇巨，家中负债累累，成为贫农。两相对照，倒是可以猜测出赵树理写《悔》和《白马的故事》的意图。“文革”时期批判赵树理，挖到老根，认为“悔”是对革命的后悔，显然是过度阐释无限上纲。

值得注意的是，两篇小说完全是五四新文学的写法。这说明赵树理并非不能驾驭这种文字，也说明他之后的转变是自觉的。他自己说，“我在学生时代也曾学过五四时期的语体文（书报语，不能做口头语用）和新诗（语言上属翻译体），而且有一度深感兴趣，后来厌其做作太大，放弃了。”^②更正统和学术一点的说法是：“新文学的内容固然是进步的，但形式却不为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新文学圈子小得可怜、高得难攀，它们似乎是一种只在知识分子和文艺爱好者、写作者之间交换传阅的‘交换文学’，跟老百姓是无缘的。他们所喜欢的还是那些千古流传的民间故事，以及饱含封建毒素的唱本读物、通俗小说。农民的态度动摇了他对‘欧化句法’的崇拜，他决定进行一种新的尝试，另辟蹊径，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来创作。”^③不过，这种说法偏于理性，我更愿意相信赵树理从小耳濡目染的农村民间艺术已经深植其内心，成为他不自觉的文学选择。

当然，事情也并不是这么简单。这还关系到新文学方向

① 参见史纪言《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

② 《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7月。

③ 参见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的选择。尽管“大众化”成为新文学的一个共识，但如何大众化却也有许多争论。一种是坚持以五四新文学为基础，另一种则希望用民间形式来改造新文学。赵树理自然属于后一种。不过在当时，赵树理的主张并不占上风，文艺界、文化界多数人主张第一种，认为五四新文学虽然是源自资产阶级的，但总是比民间文艺来得高级。这两种看法被分为“新派”和“旧派”，而新派无形中成为“正统”。赵树理受到打压，被嘲笑为“庙会作家”、“快板诗人”，还被戴上“庸俗化”的帽子。而赵树理也反唇相讥，将模仿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诗体的作品称为“有点（省略号）、带杠（破折号）、长短不齐的楼梯式，吗呀体”。1941年他还同王春等人成立“通俗化研究会”，要旗帜鲜明地对着干。上党梆子戏《万象楼》就是这个时候的作品，他自己说他是“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赵树理的最后一个作品，同样也是上党梆子戏）”，可见他是把民间的通俗化的努力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起点和目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说自己不属于“文坛”，而属于“文摊”。

1942年对赵树理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做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报告，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为的问题、普及和提高的问题，都有了一个“权威性”的结论。不过赵树理所在的太行地区，消息相对闭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一年之后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讲话》传到太行山根据地后，赵树理大为兴奋，认为是毛主席批准了他的写作主张。1943年5月，他写好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却还是一直得不到出版的机会，后来是通过浦安修（时任北方局妇救会负责人）将书稿转到彭德怀手中，彭德怀看了后，

写下“像这种从群众调查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的批语，交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让书店出版。

《小二黑结婚》出版后，盛况空前。戴光中先生在《赵树理传》中这么描述：“《小二黑结婚》出版后的盛况，大大出乎所有人——无论是作者，支持者还是反对者——的意料。自‘五四’以来，还没有过一本新小说能在农村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它在穷乡僻壤不胫而走，被农夫村妇交相传阅，在地头、炕头、饭场上，到处可以看到阅读《小二黑结婚》的热烈场面。过去，新华书店出版的文艺书籍以两千册为极限，可是这本其貌不扬、封面特意标上‘通俗故事’字样的小书，却连续印了两万册还是供不应求。翌年三月，新华书店决定重新排印、再版两万册。并加以说明道：‘这本为老少爱读爱听的自由结婚的通俗故事，自去年九月出版以来，风行一时，不日就卖完了，本店为满足各地读者的需要，特再版发行。这次是用大号字排印，并附有趣的插图。’”^①同时，小说还被改编为十数种地方戏搬上舞台，大家扶老携幼、翻山越岭争看小二黑。

《小二黑结婚》的成功，让“旧派”觉得扬眉吐气。华北新华书店当时只出版和他们相近的作品，而那些欧化一点的诗文就都得不到出版了。

1946年，赵树理正式获得官方承认。这一年郭沫若、茅盾和周扬先后发表文章称赞赵树理的创作。周扬称之为“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是“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第二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根据中央局宣传部的指示，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正式提

^① 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出“赵树理方向”。不过，这样的承认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赵树理所信奉的以民间文艺传统为主的文学主张获得认可，另一方面也可理解为“文坛”对“文摊”的收编，用今天流行的话说，那就是赵树理“被文坛”了。而且，其中可能还牵涉到延安文学内部复杂的门户之争，比如周扬和丁玲的矛盾，周扬需要在创作上树立一个榜样来抗衡丁玲。这从当时推荐作品到苏联评选“斯大林文艺奖”的纠纷中也可以看到端倪。评选的结果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奖。这几年一些研究者在研究 20 世纪 50—70 年代文学时，会注意到所谓的“东、西总部胡同之争”。东总部胡同是指作协，西总部胡同是指工人出版社，具体的人物就是丁玲和赵树理。虽然具体的史实并未厘清，还有争议，但话题背后凸显出来的文学问题却是重要的，那就是民间文艺传统在当代文学的命运问题。

事实上，如果我们承认“文坛”和“文摊”有两套评价标准，而且很多时候这两套标准并不能相容，那么赵树理由“文摊”到“文坛”（不是用“文摊”来取代“文坛”），他就要接受“文坛”标准的评价。所以尽管他贵为“方向”（实际上 1949 年之后文艺界就很少再提“赵树理方向”），但仍然摆脱不了他不断遭受批评的命运。1951 年初，胡乔木把赵树理找去谈话。赵树理事后回忆：“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我读一些借鉴性作品，并亲自为我选定了苏联及其他国家的作品五、六本，要我解除一切工作尽心来读。我把他选给我的书读完，他便要我下乡，说我自入京以后，事也没做好，把体验生活也误了，……凭以前对农村的

老印象，是仍不能写出好东西来的。”^①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我们会发现，在小说的评价中，获得赞誉的，多是从五四新文学那里获得继承的小说，更确切说，是从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那里获得写作资源，而少有来自民间文艺传统的。即使有，也评价不高。赵树理的唯一长篇小说《三里湾》，出版的时候虽然颇受好评，但一俟同样题材的《山乡巨变》和《创业史》出来，评价的喜好就转移了。小说都如此，更遑论那些根本就不入文学史视野的其他民间文艺样式了。很难想象文学史会把赵树理的上党梆子戏《万象楼》作为研究对象，最多也只是在作家介绍时捎上一笔。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所谓的文学史评价是专横的，充满暴力的。它人为地划分了高下等级，把一些优秀的作品排除在外。而赵树理则通过自己的创作表明，民间文艺传统并不比任何传统来得低下，依靠它同样也能写出最优秀的作品。我想，这是今天赵树理的创作给我们的一个最重大的启示。对于“大众化”、“通俗化”，长久以来的认识误区，就是认为虽然很重要，但终究是普及的，是低级的。而高级的东西还得是阳春白雪的，却没有想到“大众化”、“通俗化”并不仅仅是阳春白雪的普及版，它同样也可以是高级的。

1966年赵树理受批判的时候，写过一个检查材料，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民间文艺传统的，说得颇为伤感。写这个前言的时候，我重看这篇文章，突然想到赵树理所想要挽留和继承的东西，现在几乎都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都像宝贝一样被供起来，要获得商业利益了。想来不胜唏嘘，就把

^① 《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7月。